

“两个维护”： 理论渊源、历史根基和实践依据

杜家丞

【摘要】“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其理论渊源、历史根基和实践依据共同构成“两个维护”的逻辑基础。就理论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融合;就历史而言,它是党的百年建设史经验的提炼;就实践而言,它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两个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号:21&ZD039)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两个维护”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厚重的历史根基和坚实的实践依据,三者共同构成“两个维护”的逻辑基础。目前,理论界、学术界对“两个维护”已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但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如在理论方面,着重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多,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相互融通、共同作用的少;在历史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叙述的多,对此后历史时期探索实践阐述的少;在实践方面,从党的政治建设角度论证其重要性的多,从党的组织领导体制视角加以探析的少。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两个维护”的逻辑基础,以深化人们的相关理解和认识,真正做到“两个维护”。

一、“两个维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融合

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共产主义政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做过若干重要论述。他们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协调,共同形成了“两个维护”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共产主义运动中高度重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作为“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具有接受下级工作报告、召集非常代表大会、处理重新入盟成员、管理半数盟费等权力,从政治、组织、财政各方面建立起同盟的集中统一领导。^①其后,欧洲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同盟面临改组。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盟内区部和支部“渐渐地中止了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的组织涣散现象,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②。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克服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主义分裂活动,维护了盟中央权威。1864年第一国际创立,

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第一次有了“联络和合作的中心”^③。如马克思所言：“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④在与巴枯宁分子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论权威》等著作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问题：第一，权威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概念，它既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其应用范围又“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在资本主义时代权威“趋向于日益扩大”^⑤，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权威才能对抗资本权威。第二，加强集中和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教训，“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第三，加强集中和权威是对内战胜巴枯宁主义宗派分裂活动、对外进行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⑥。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证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价值。

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在探索执政党建设、领导苏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实行地方自治制的松散联合的组织，实际斗争的效果总难达到预期，列宁认为“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⑦是其中重要原因。为此，他主张首先要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培养出“‘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⑧；其次创办全俄政治报纸，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代办员网改组地方委员会，从而把分散的地方组织联合成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不懈努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式建立，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领导中心。列宁

一方面与召回派、取消派和调和派分子作斗争，另一方面努力争取包括孟什维克中护党分子在内坚持真正统一的大多数党员，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捍卫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创建共产国际的全新革命实践中，完善和总结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威的理论观点：其一，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内战争时期，必须使“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执政后，“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⑩。其二，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党的领袖集团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组成，集团内部实行“集体管理制”，但“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实际工作则“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⑪。由此，列宁第一次揭示了党的领导的层次性，即党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一领袖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批判和革命活动过程中从未忘记东方社会的重要历史地位和特殊性。马克思指出，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都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的事业。^⑫马克思准确地把握住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起源和本质。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治水过程中体察到，要克服自然灾害、实现世代繁衍，必须有“天下一家”的统筹治理。及至晚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不同思想流派纷纷寻求定乱致治之道：孟子面对梁襄王“天下恶乎定”之问，明确表达了“定于一”的政治主张，并期盼由仁君圣王以道德表率教化万民；管仲、慎到、韩非子等法家思想家提出“安国在乎尊君”^⑬的政治原则，主张由君主执掌最高政治权力、裁决国家大政方针、保障政局安定团结，

所谓“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⑩。可见，尽管各派具体观点相异，但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想和最高权威唯一性上高度一致。秦兼并天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社会改革，废分封而置郡县，虽因严刑苛政二世而夭，却为后世中央集权制和“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汉政之初，郡国并存而终致“七王之乱”。及至武帝，董仲舒上天人策，主父偃荐推恩令，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标志着中央集权制真正巩固，海内一统真正实现。自汉以后，尽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关系时有反复、统一与分裂状态常有更替，以最高权威为支撑、以中央集权制为载体的“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古代主流政治形态：首先，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依靠“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其次，政治理念的实施必须以政治制度为载体，中央集权制被证明是数千年来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再者，政治制度的运转必须有政治权威作支撑，这个权威是礼治秩序之象征、道德秩序之楷模、政治秩序之枢机。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⑪不难看出，“两个维护”正是依循与中国传统政治相似的逻辑发展而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是党的领导，“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⑫；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⑬；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是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领导力量、党中央作为决策领导中心、党的领袖作为权威领导核心的论述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尊崇权威的政治原则相互融通，共同形塑“两个维护”的理论逻辑。

二、“两个维护”是党的百年建设史经验的提炼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大地，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不能摆脱其对党内事务的直接干预。正因为如此，以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为主要领导人的早期中共中央均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推行、宗派主义恶劣习气蔓延全党，坚持正确主张的党内领导人受到排挤打击，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作为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开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也因此得以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红军得以实现长征胜利，革命得以转危为安。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⑯，1942年，《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建立起党对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1943年，《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赋予中央书记处主席“最后决定之权”^⑰，这些举措都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正式建立准备了条件。1945年，党的七大及其后的七届一中全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真正实现。解放战争期间，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党中央一方面提出建立报告制度，“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⑱；另一方面健全党委制，要求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正确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

废”^②。由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以加强,有力保障了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建政伊始,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毛泽东指出要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关键一条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③。1953年后,为适应全国大规模建设需要,党对领导体制作出重要调整:加强中央对地方行政机构的领导,大行政区一级不再作为地方最高政权机关存在,并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等中央领导机构,加强领导的集中性与计划性^④;加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领导^⑤;着眼于增强党的团结、防范“高饶事件”再次发生,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发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⑦。其二,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⑧。其三,党委工作必须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八句歌诀,第一书记对于大事“一定要问”^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面临严峻考验。毛泽东洞察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之关键,在“九·一三”事件后即着手重建各级党组织的权威,起用一批对党忠诚、善于治国的领导干部,重申“政治局是管全部的,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⑩,客观上为结束内乱局面、实现历史转折准备了干部力量。如邓小平所言:“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⑪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接力奋斗,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多次提出加强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强调民主“不能破坏集中”^⑫，“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⑬。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⑭,为“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途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有人对党和国家是否还需要民主集中制的质疑,江泽民明确表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展”^⑮。他一方面申明加强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⑯,另一方面提出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方针,强调“主要领导既要有魄力,善于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果断拍板决策,又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善于集思广益,实行正确的集中”^⑰。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写入党的决议之中。^⑱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申“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⑲,并提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胡锦涛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本身就包含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个方面,要全面准确加以理解。”^⑳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日益完善密不可分。

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④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在挫折——胜利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这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为这个百年大党打下的深厚根基，“两个维护”则是在这历史根基之上结出的硕果。

三、“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的關鍵

“两个维护”的提出不仅是理论和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直接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着眼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致力于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为“两个维护”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续推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巩固。同时，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发生极大改变，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复杂化，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党内，给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一是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在少数地方盛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影响恶劣，塌方式腐败和系统性腐败所在多有，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利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涉案金额之大、涉案面积之广让人触目惊心；二是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办事决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领导班子

民主不够、集中不足，组织生活漫不经心、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三是纪律松弛，尤以政治纪律为重，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的问题导向，从作风建设切入，保持高压反腐态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⑥。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经验，郑重提出“两个维护”，并以坚持和完善党的组织领导体制为抓手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管党治党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在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⑦，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为此，党中央提出从党的组织建设着手，不断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领导体制：第一，修订党章、修改宪法，为“两个维护”领导体制奠定法理基础。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规定写入党章^⑧，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建议把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⑨，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两个维护”领导体制奠定组织基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合理归并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

机构,统筹党政机构设置,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健全了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第三,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为“两个维护”奠定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大以后,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⑤;《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确立了请示报告的工作体制,要求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原则和问题,国家安全、港澳台侨、外交、国防、军队等党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事项,以及其他只能由党中央领导和决策的重大事项,必须向党中央请示报告^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保证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经过几年来全党的共同努力,“两个维护”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这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加以概括。其一,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拓展,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这是落实“两个维护”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正因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日益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范化解国际风险等重大斗争中才更有信心、定力和底气。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正是因为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党全国万众一心开展疫情防控,使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恢复,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防控无力、民众持续

恐慌、经济急速下滑的乱状形成鲜明对比。其二,民主集中制在新时代得到创造性运用,这是落实“两个维护”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说不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致的,并不矛盾。”^⑦“两个维护”不仅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反,它是新时代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⑧“两个维护”作为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必须在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创新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⑨从“两个维护”到“两个确立”,体现了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力量的最新认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研究和落实“两个维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深挖理论资源,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增强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在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体悟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的必然要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4-5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4、562页。

-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276-277页。
-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6、500页。
- ⑦《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 ⑧《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116页。
- 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5页。
- ⑩《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5、27页。
- ⑪《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6-728页。
- ⑬《诸子集成》，第5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79页。
- ⑭许富宏撰：《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0页。
- ⑮《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页。
- 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72页。
- ⑰《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60页。
- 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
- ⑲《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 ⑳《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04页。
- ㉑《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 ㉒《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 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1页。
- ㉔《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 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 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8、60页。
- 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 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 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8页。
- 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356页。
- 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1页。
- ㉜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310页。
- 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95页。
- ㉞《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
- ㉟《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 ㊱《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289页。
- ㊲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 ㊳《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62页。
- ㊴《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 ㊵《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 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 以求真务实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
- ㊷《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页。
- ㊸④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515页。
- ㊹④⑨《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5、814页。
- 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
- ㊻丁薛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8日。
- ㊼⑤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6、127页。
- 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作者简介】杜家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22.3.25~32